

开栏的话

人类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渴望交流交融之心促使道路开辟、文明互动。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桥梁，也是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自本期起，本版推出“丝路回响”栏目，介绍和讲述古今丝路上的文明故事。

——编者

◎丝路回响（一）

重返刺桐港

本报记者 郑娜

公元562年，是印度高僧真谛三藏到达中国的第16年。

时为南北朝时期。与同时代的印度僧人一样，他搭乘商船循海路来到中国。海路虽也艰险，但还是比陆路快。抵广州后，他一路颠沛到南京，却因战乱不得不再度掉头南行。在福建泉州，他找到了东临县城15里、南距大海30里的九日山延福寺，停留下来，一边翻译《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准备南航马来半岛。

彼时，泉州已经有大船通航南洋。以海为生的当地人，早已深谙如何利用季风和洋流规律，在夏天的4月、冬天的10月归航出航，进行海外贸易。他们顺应天命求生谋业，等待着历史的选择。

壹

真谛三藏离开泉州后不久，伊斯兰传教士也从海上进入泉州。

史书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至626年，穆罕默德派遣四贤徒来华传教，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什谒，四贤我高仕传教泉州，死后葬在东郊的灵山。

同样是618年，视线往北，隋炀帝刚在江都被杀，新生生的唐朝迁都长安，啼声初试，正孕育着一次规模盛大的对外开放。

偏南一隅的泉州既无战事之扰，亦无灾害之虑，深耕已久的港口迎来重要发展期，逐渐将航线延伸至印度洋、波斯湾、红海。

佛教来了，伊斯兰教来了，印度教来了，摩尼教来了；阿拉伯人来了，印度人来了，东南亚人来了，非洲人也来了；商人来了，传教士来了，学者也来了……

到唐中期，虽然与“万国衣冠”的长安比起来，泉州还只是“市井十洲人”，但也商贸繁荣，外商云集，东方大港、文化名都的雏形已然显现。据成书于唐会昌六年（846年）的《道里邦国志》记，彼时泉州已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为中国四大港口。

唐末，由于黄巢起义，广州元气大伤，杭州、宁波又离南海诸国较远，位于它们中间的泉州，在运费、时间和安全上达到“最佳性价比”，竟意外成了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分化组合后的最终选择，于南宋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公元1166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职能）被取消，而泉州的市舶司从公元1088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472年，前后长达386年之久。

南宋时期，泉州市舶司的收入一度成为财政的救命稻草，达到200万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5%。

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为了适应海外商贸的发展，泉州在唐朝子城的基础上兴建罗城，泉州城由原来的3里达到了20多里，街道拓宽，并设立7座城门。围绕泉州城遍植风景树——刺桐，从此刺桐就成为泉州的象征。

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如果亚历山大港或其他港有一艘胡椒船到诸基督教国，我敢说刺桐港的胡椒船就有100艘。”

在阿拉伯国家，同样有着“ZAITUN”（刺桐）的记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记述道：“我们渡海到达第一座城市是刺桐……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

那个时候，泉州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刺桐港进口商品高达300多种，主要有象牙、珊瑚、玳瑁、龙脑、苏木、白豆蔻、驼毛布、织金软棉、槟榔、水晶、鹦鹉等香料、药物、宝货。出口的货物有云南的叶金、浙江的瓷器、苏杭的色缎、明州的草席、温州的瓷器、镇州的锡罐等共计90多个种类。

因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当时这里还侨居着一二十万阿拉伯人、波斯人、法兰克人、印度人、犹太人等，并存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包括佛家、道家、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等。东西方文明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景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惊叹不已。

贰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一件重大的情事，牵涉广泛，竟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当中必有理由，是为历史的仲裁。

刺桐港同样如此。明清的海禁政策，像利剑一样斩断泉州的经济命脉。繁荣数百年的刺桐港慢慢

衰落，渐渐退出大港的序列。接近400年的鼎盛转眼凋敝，挽歌却没有因此唱响。乘风破浪的天性与后天机遇的垂青，早已使海洋文明中的开放与包容，沉淀成为这座城市的宝藏。

一切都等待着世人的重新发现。

在沉寂了500年后，刺桐港终于等来再次改变他们命运的人。他就是杜杜·迪安博士。

1991年，迪安博士作为总领队，带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游轮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一路经过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来到中国。

“我相信是一只上帝之手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时至今日，杜杜·迪安博士回忆起来仍十分激动。

他记得，由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交官、学者、记者组成的考察团在泉州期间，考察了许多海上丝绸之路遗迹。当他们看到中国本土的关帝庙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紧邻，而斜对面就是印度正教遗址，不同宗教于一地共生共荣；看到古老的清真寺，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消失的波斯摩尼教，到现在还有人去礼拜、烧香，无不啧啧称奇。参观完摩尼教遗址草庵后，迪安博士当场宣布：“这是考察团此行最大的收获。”

那次考察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泉州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名字再度为世界所知，随即开启了20多年漫长的申遗道路。直到2016年，终于得以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古泉州（刺桐）史迹”，正式代表中国申报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泉州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包容、经济繁荣、自由开放的城市范本。”现任泉州市市长康涛这样阐释古泉州（刺桐）史迹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在褪去世界第一大港光环的500年后，这座城市希望以申遗为契机，再度复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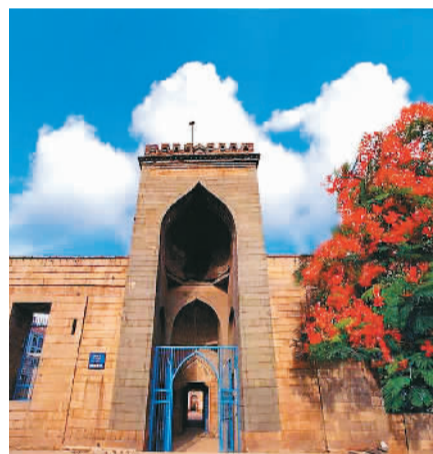
泉州海交馆内的古船模型及古代航海路线图（陈起拓摄）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泉州的刺桐花（泉州网）



清静寺

悠久的海上交通历史、盛极一时的对外文化交流、璀璨的海洋文明，泉州的故事注定是精彩而令人回味的。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选出了80位青年代表，到泉州考察学习。他们中很多人不了解泉州，对“一带一路”也知之甚少，但经过几天参观学习后，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的意义。

来自阿联酋的大学生曼苏尔对记者说，亲眼看到，才深刻了解到丝绸之路的伟大。“它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曼苏尔特别喜欢泉州的清静寺，并在那里做了祷告。看到那么多不同的宗教集中在一个地方，他觉得太美了。正如迪安博士说的：“树叶在战斗，根却在亲吻对方。”

这句来自西方的古老谚语，想必1500年前就在泉州流传过。

古泉州（刺桐）重要文物及史迹



九日山祈风石刻

香、龙涎香等香料，还有唐宋古钱、宋代陶瓷制品等物，总共重达4700余斤，是泉州蓬勃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力证。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清静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清静寺占地面积2184平方米，整体

为石构建筑，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具有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功能空间上大分散、小集中特点。留存主要建筑为门楼、礼拜殿、明善堂等部分。它是泉州海外交流重要史迹之一。

中国现存最多的祈风石刻群

九日山以“山中无石不刻字”饮誉宇内。有我国现存最多的祈风石刻，历代摩崖石刻达75方，其中海交祈风及市舶司石刻13方，记载了从南宋淳熙元年至咸淳二年（公元1174—1265年）冬季遣舶和夏季回舶的祈风情况。

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是古代中国桥梁建筑的杰作之一。北宋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1053—1059年）由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造。桥长834米，宽7米。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其“筏型基础”、“种蛎固基法”，是中国乃至世界造桥技术创

举，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

世界仅存的摩尼教石雕佛像

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是研究世界宗教史及中外交通史之重要实物依据。据史料记载，摩尼教在我国旧称“明教”，公元3世纪中叶在波斯创立，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到明初，朱元璋嫌其教名上逼国号，遂驱逐信徒、毁坏寺院，摩尼教逐渐被其他宗教所融合。寺中的摩尼光佛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

800多年的海上行船航标

姑嫂塔又称“万寿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它背靠泉州湾，面临台湾海峡，有关锁水口、镇守东南的气势。南宋时期，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当时姑嫂塔成为了海上行船的航标。

2017年是中国开始启动申报世界遗产的第30年。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经从1987年时的6项增加到现在的50项，包括35项文化遗产、11项自然遗产、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具有很强的世界遗产研究、保护和管理能力。世界遗产也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自然多样性的最具影响力的窗口。

30年世界遗产的实践，使中国对保护对象的认识从文物保护扩展到文化遗产，促进了对文化遗产资源的重新认识。2011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点的数量达到了766722处，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确定的文物点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世界遗产带来的对新的遗产类型的认知，比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等。

世界遗产带给中国更为重要的变化，是给了中国的遗产保护界一个全球的视野，从世界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意义，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在丰富、多样的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认识在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世界其他文明或文化的影响。这种视野，使得又促进了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与国际视野

吕舟

世界遗产的申报需要把申报的对象放到一个价值语境当中，与世界其他类似或相关的遗产进行比较，以确定申报的遗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需要的“突出普遍价值”。这种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者对世界其他相关遗产的特征和价值清晰的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在构建一个被各国认同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200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澳门历史城区，强调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并峙、对话和交流；2009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五台山，表达了佛教在中国得到弘扬和发展之后对世界的影响；2014年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不仅表达了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影响，而且也强调了沿线其他国家和文化对这种交流的影响；2018年准备申报的“泉州史迹”，是10—14世纪不同文化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历史见证；2017年即将在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讨论的申报项目“鼓浪屿”，则是现代社会全球化初期文化对话、交流，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例证。

这些申报项目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对于历史遗迹通常所理解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层面，它们更是在文化、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方面关注对象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形成了今天世界遗产领域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为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世界遗产申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对一处遗产的保护。我们要通过世界遗产讲述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把反映中国完整文明发展历程和影响、改变世界生活方式的遗产作为优先申报世界遗产的对象。这也是对今天世界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